



姓名：蕭阿勤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 社會學博士

現職及經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名稱：

- 1.〈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6(2): 77-138 (2000)。
- 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9(1): 181-239 (2002)。
- 3.〈認同，敘事，與行動：臺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臺灣社會學》5: 195-250 (2003)。

中文簡介：

筆者在 2000 年出版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一書，探討 1980 年代初以來臺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的發展，分析「人文知識份子」(文學作家、文學批評者、本土語言復興運動者、以及業餘的或專業的歷史研究者等) 投入台灣民族主義政治活動的歷史過程。這本書指出八〇年代初前後，美麗島事件與政治反對運動對這些人文知識份子影響重大，使他們的國族認同有所轉變，逐漸投入政治反對運動。換句話說，人文知識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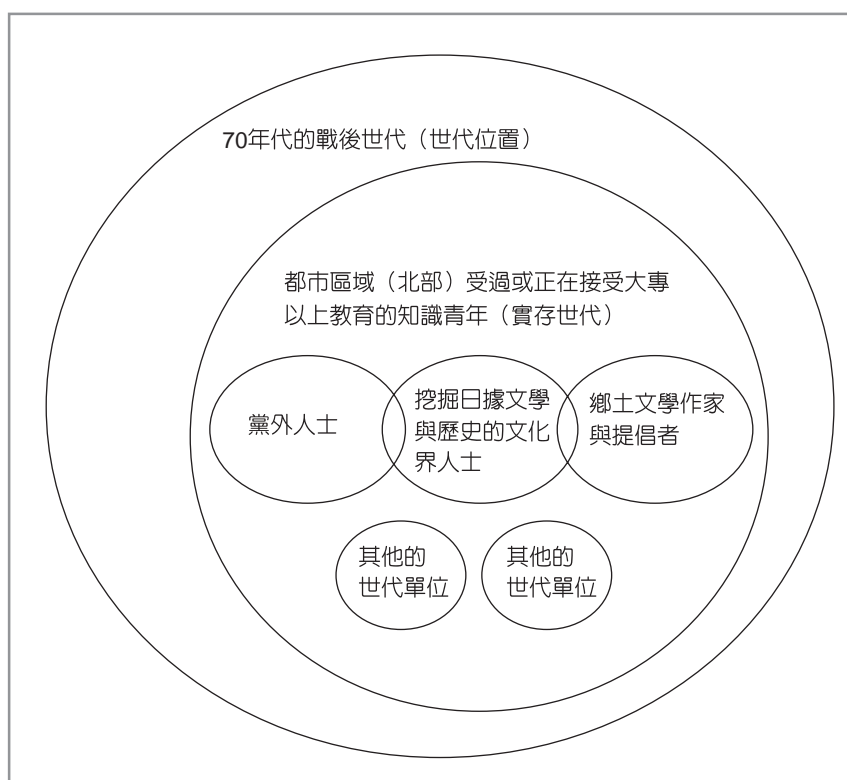
的「文化民族主義」受到政治反對人士的政治動員所激發，他們的活動逐漸成為八〇年代後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部分。

這次獲獎的三篇著作，是筆者延續上述專書的研究，目的在探討七〇年代與國族認同政治有關的文化變遷，以釐清七〇的文化政治變化與八〇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歷史聯繫。這三篇研究，主要藉助於西方有關「世代」與「敘事認同」的研究理論，用以分析戰後出生或成長的年輕人在七〇年代有關國族認同的文化與歷史建構。基於社會學家 Karl Mannheim 關於世代研究的概念（世代位置、實存世代、與世代單位），筆者的研究重點是那些對後來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或對台灣民族主義發展最重要的三群戰後世代成員，亦即投入黨外政治運動、致力於挖掘日據時期歷史與文學、以及提倡鄉土文學的政治或文化界的年輕世代（圖一）。

七〇年代是戰後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的啟動時期。七〇年代初，臺灣的外交嚴重挫敗（釣魚台主權爭議、退出聯合國、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

上海公報、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等），國際處境相當艱困，而國內社會政治局勢也產生重大變遷。當時在國民黨統治體制下成長與受教育的戰後世代，逐漸成為要求社會政治改革與推動「回歸現實」、「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主力。筆者研究的焦點在於分析這種發展過程中，戰後世代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取向的歷史敘事與他們的世代認同、對台灣文化與歷史經驗的強調、以及其社會政治改革主張、行動的關係。

這三篇論文的貢獻大致可分述如下。在經驗發現上，筆者指出：第一、七〇年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積極因素，在於不分省籍的戰後世代所形成的廣泛社會力量。這股新的社會力量形成的必要歷史條件是，戰後世代



圖一：Karl Mannheim 概念下的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

人口大幅增長以及高等教育的顯著發展，使年輕知識階層大量出現。至於充要的歷史條件，則是釣魚台主權爭議、退出聯合國等重大政治事件。對政治現狀不滿、挑戰國民黨統治體制的年輕世代，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下民主教育的產物。第二、七〇年代的黨外人士、挖掘日據時期歷史與文學、以及提倡鄉土文學的文化界人士，是對後來台灣民族主義發展或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最重要的三群戰後世代成員。鄉土小說家及支持鄉土文學者以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來理解鄉土文學的重要性；而重新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也以這種歷史敘事來確認殖民時期文學的歷史定位。此外，黨外人士也憑藉類似的歷史敘事，將個人自我與社會、國家、民族聯繫起來，建構「戰後新生代」的集體認同感，並以這種歷史敘事來理解臺灣的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的政治社會運動史）。第三、七〇年代覺醒的戰後世代，其世代意識的主要參考架構為國族的歷史敘事。他們的回歸現實或鄉土理念的性質，是在歷史意識上，將臺灣的鄉土歷史經驗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中，成為其敘事情節的一部份。回歸鄉土的理念既強調臺灣歷史經驗的特殊性，也在於尋找與確認其中國特性。戰後世代關於臺灣歷史經驗的集體記憶建構是「改良主義」的(reformist)，相應於其社會政治變革主張的改良主義。

在理論意涵方面，筆者指出：第一、在分析上，集體記憶是關於集體經驗而被「結構化」或「模式化」的歷史敘事。（族群或國族）集體認同是個人在特定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的過程與結果。集體歷史敘事與集體認

同，彼此互相限制，互相建構。敘事與認同為一體兩面，無法二分。第二、族群與民族主義認同政治所涉及對立的「歷史詮釋」，不是因為不同的敘事情節所涵蓋的歷史經驗或事件有所差異，而是在於人們從不同敘事者的主體位置出發，賦予歷史經驗或事件在不同的整體情節中不同的位置與意義所致。情節構成一個整體，經驗或事件的意義來自這個整體結構以及它在整體中的位置（而非個別的經驗或事件的累積才歸納地發展出整體的意義架構）。

至於這三篇研究的經驗發現，與筆者上一階段研究的關係，簡單地說，則是：第一、七〇年代戰後世代所發展的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文學、以及黨外的臺灣歷史探索，提供、準備了八〇年代後臺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情節所需的素材。不過七〇與八〇年代的敘事主體並不相同：七〇年代歷經十年所挖掘關於臺灣的過去，在當時主要仍然以中國民族主義為詮釋架構；但在八〇年代之後，它們則成為臺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情節現成的材料，根據新的行動的問題意識而被賦予新的意義，新史觀也迅速浮現。第二、七〇年代反國民黨的黨外政治人物與人文知識分子在國族認同上仍自認屬於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臺灣人，在社會政治上追求民主革新與省籍平等。其中，人文知識分子的中國認同，一般而言更為強烈。至於八〇年代之後，人文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的台灣國族認同發展，則是漸進浮現的結果。尤其在美麗島事件後，黨外政治人物比人文知識份子更迅速激進化。人文知識份子在國族認同與政治主張的遲緩轉變，可以說反映其社

會特質，亦即從知識與文化傳統學習而來的深刻慣習。七〇年代戰後世代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內化，事實上就顯示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在教化戰後世代上的成功，亦即在形塑其慣習上的成功。

這三篇研究的進一步經驗發現，也具有歷史比較的意涵。世界各地的戰後世代，在二十世紀後半的當代政治與文化變遷中，都扮演重要角色。譬如西方關於「六〇年代的世代」(the sixties generation)的研究，就指出他們對至今的政治與文化有重大影響。目前關於台灣戰後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深入探討戰後世代對台灣晚近三十年政治、文化變遷的重要性。這三篇系列論文指出，七〇年代步入成年早期的戰後世代在當時政治、文化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那些發展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文學與社會政治運動史、以及投身政治反對運動的戰後世代，對後來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更是影響重大。九〇年代以來，在台灣政治與文○化上佔據重要策略位置而掌握權力的，絕大多數正是在七〇年代投身於政治與文化公共事務而崛起的戰後世代。七〇年代之前，不少中、西文文獻描述台灣的戰後世代，經常提到他們個性消極順從，只專注於學業，追求個人成就，對社會政治事務相當冷漠，而台灣也沒有出現類似六〇年代西方反抗現有體制的青年學生運動。然而基於這三篇研究，我們可以說，台灣並非沒有戰後世代批判、反抗體制的現象，而是較西方的普遍現象晚了十年左右才出現。由於台灣特殊政治與文化的歷史條件，這種現象到七〇年代才普遍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七〇年代推動社會政治改革與

回歸現實、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戰後世代，包括二十幾歲到四十幾歲的成員，亦即涵蓋了比西方六〇年代青年學生運動份子更廣泛與更年長的成員。在台灣，戰後世代與政治、文化變遷的研究，應該重視的是關鍵的七〇年代。

評審簡評：

蕭阿勤博士提出的三篇論文有二篇發表於〈臺灣史研究〉，一篇發表於〈臺灣社會學〉，這二份期刊都是目前國內臺灣史和社會學最重要的學術期刊。這三篇論文分別透過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以及黨外的歷史建構等三方面來分析一個主題：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的文化與政治精英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蕭博士指出，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的文化、政治運動者基本上是溫和的改良主義者，政治上要求平等，文化上以中國為認同對象，並無激進的臺灣民族主義主張。然而，這些回歸鄉土、回歸現實的文化論述卻成為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民族主義的重要素材。這三篇論文展現了蕭博士對於相關理論、文獻與史料的深入掌握。這一系列的論文細緻分析了集體記憶、歷史敘述、集體認同與公共領域的關係，清楚地釐清了這些重要概念的理論關連。此外，這一系列論文對於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社會的分析和瞭解也具有開創性的貢獻。